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转换途径

——基于分工动态循环演进的视角

谷 慎¹, 马敬彪¹, 马翰墨²

(1.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 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2)

[摘要]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分工动态循环演进”的概念框架,并在此概念框架下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进行理论分析,得出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一不同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的结论。之后,采用我国198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并得出,我国要顺利实现二元结构转换,关键是要通过农业产业化、农业促进制度和普惠金融力推农村企业和市场发展,以企业和市场的发展带动农村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距;农村产业化;城乡统筹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5)01-0083-10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政府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阻碍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桎梏。因此,找准实现二元结构转换之抓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成为现阶段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关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理论界早有关注,我们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一部分学者利用不同指标,从不同角度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与发展进行刻画,并在此基础上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提出政策建议^[1-3]。另一部分学者从政府政策、体制差异、制度变迁等制度层面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二元结构转换的对策建议^[4-8]。其中,政策层面上,刘新认为:“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等一系列政策安排,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推进现代农业和农村新社区建设、促进农民市民化是消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途径^[4]。袁志刚、解栋栋认为:制度、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再配置造成的扭曲影响,是形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应通过户籍、土地、社保制度改革,消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各种制度,实现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的协调再配置以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5]。体制层面上,洪银兴认为:我国城乡差距存在并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经济体制差异;单纯依靠非农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应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政策、提高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及市民待遇,以工促农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均衡发展^[6]。制度变迁层面上,朱志萍认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只有从制度根源入手,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强制性和诱导性制度变迁的诱导力完成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才能有效地解决城乡二元问题^[7]。蓝海

[收稿日期]2014-04-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JY098)

[作者简介]谷慎(1964—),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农村金融、金融制度与金融发展研究;马敬彪(1989—),男,山东临沂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金融学研究;马翰墨(1993—),男,北京人,西北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从事金融学研究。

涛认为,城市化导向的制度变迁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原因,成功的制度变迁才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问题的前提^[8]。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对二元经济结构成因和转换进行分析^[19-20]。例如,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用超边际分析法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对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促使二元经济结构出现和演变进行论证,并以此揭示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与演变的本质特征^[9];高帆、秦占欣利用新兴古典模型证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源于农业和工业分工程度的不同,并提出增加农业迂回生产度以提高分工水平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途径^[10];高帆推导并检验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就是一个分工组织演进问题,提出提高交易效率以促进分工组织演进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11];刘文超、白永秀指出,交易效率提升导致城乡二元经济对立程度呈现倒U型变化,并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村交易效率^[12]。

纵观已有文献,本文认为,第一部分学者的研究由于缺乏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原因的理论剖析,因此其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值得商榷;第二部分学者从“制度”出发,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原因归结为政府政策、体制差异和制度变迁等外生因素,但由于外生因素需要通过内生机制发挥作用,而这些文献没有能从内生机制上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做进一步的剖析,因此其结论稍欠准确,建议亦有很大不足;第三部分学者,包括杨小凯、高帆、刘文超等,虽然他们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沿着劳动生产率差异这条主线,对二元结构的成因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但这些研究依然不够深入,因为他们仅将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原因由城乡劳动生产率水平差异延伸为城乡分工水平差异,而对于导致城乡分工水平差异的原因没有做深入分析,所以其结论和建议的准确性亦差强人意^[9-10]。本文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分工演进的特征和规律进行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以后得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城乡间“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导致城乡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分工演进路径,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分工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水平。因此,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要找出并消除诱致农村“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与发展水平低的原因,从而使农村走出分工抑制的路径。本文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下找出了导致城乡分工水平差异以及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本文接下来的安排为:第二部分构建“分工动态循环演进”模型,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利用我国1980—2011年的经验数据对上述成因进行验证;第四部分给出本文的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成因的理论分析

从刘易斯到托达罗^①,传统二元经济理论一致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根本途径。但是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均将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外生变量给定,忽略了对形成原因的理论分析,因此他们直观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不合理配置,二元结构自然消除。由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框架不完整,因此其观点与政策主张的准确性值得商榷。杨小凯、高帆等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归结为城乡间不同的分工水平^[9,11],虽然较刘易斯等人的研究进了一步,但依然没有给出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城乡间不同的分工水平只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城乡之间“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②。因为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导致城乡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分工演进机制”和分工

^①刘易斯的无限劳动供给模型认为,伴随着传统部门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吸纳,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最终两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失;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模型的框架下提出农业不仅向工业转移剩余劳动力,还转移剩余劳动,经过三个阶段的转移,当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时,二元经济结构消失;乔根森虽强调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但仍接受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根本途径的观点;托达罗建立了农业部门、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三部门模型研究城乡之间人口迁移问题,并将之作为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本途径。

^②导致城乡间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形成差异的初始原因是自然禀赋、外来因素(例如殖民入侵)等。以后,导致城乡间企业和市场发达程度不同的原因,不同地区和国家又有所不同(即各国具有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原因构成了各国产生二元经济结构的具体原因。现阶段要解决二元结构问题,关键就是要找出这些具体原因,并分别施以对策。

演进路径,所以城市分工演进机制更趋完善,形成分工深化路径,而农村不够完善,形成分工抑制路径。在不同的分工路径下,城市的分工被不断地深化和细化,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而农村分工被抑制,劳动生产率水平、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也被抑制,最终城乡之间形成二元经济结构。在此,本文所称的“分工演进机制”亦称“分工动态循环演进机制”,指的是分工自我繁殖、自我累进的动态循环过程。分工的自我繁殖机制和自我累进机制共同构成了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机制。

(一) 分工动态循环演进理论的提出与推演

本文认为,分工沿着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演进:水平演进表现为社会分工细化,专业化实现水平发展;垂直演进表现为组织内分工深化,专业化实现垂直发展。在整个分工演进过程中,市场是社会分工细化的平台,即社会分工由市场主导,并在市场中实现。企业是垂直分工的载体,既主导组织内分工,同时也参与社会分工。由此,形成两个机制——社会分工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促进机制,以及组织内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的相互促进机制。这两种机制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分工动态循环演进机制,并促使分工不断细化和深化。而随着分工细化与深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也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1. 分工的自我繁殖。分工的自我繁殖指的是企业内分工不断深化促进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又引致企业内分工,最终分工不断自我深化。因此,企业是分工实现自我繁殖的关键。马克思曾将企业的作用归结为组织生产并协调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14]。科斯将企业定义为与市场机制相对立的资源配置方式^[15]。因此本文认为,企业的本质在于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产出水平。为了提高产出水平,企业会不断深化分工,增加中间产品,拉长生产链条。但是生产链条增长、生产迂回度增加,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会同步增加。为降低成本,一些新的中间产品会被分离出去,并由此产生新的企业(新企业的出现,又使社会分工得以细化),而新企业内部又会开始新一轮分工深化并再次分离出新企业。所以,在市场条件下,分工作具有自我繁殖功能,企业既是分工的载体,又是分工的推手。在企业的推动下,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相互促进,循环演进,并由此形成分工的自我繁殖循环机制。因为企业是实现分工自我繁殖的载体,所以企业的发育程度决定了分工的自我繁殖能力。

2. 分工的自我累进。分工的自我累进指的是社会分工细化促进市场规模扩大,市场规模扩大又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细化,分工被不断自我细化和深化。分工的自我累进必须借助市场实现,其自我累进过程可由如下模型描述^①。为简化推导,本文做如下假定。

假定1:市场总产品包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类。其中总产品种类为 m ,且 m 保持不变;贸易品种类为 n ,非贸易品种类为 $J(J = m - n)$;市场主体对所有产品均有需求。

假定2:每一个市场参与主体均生产一种以上产品,但只向市场出售一种产品,同时还要从市场购买其他产品。

假定3: X^d 为某一市场主体对某一贸易品的购买量; $1 - k$ 为单位交易成本; kX^d 为购买者实际得到量; X^s 为某一市场主体对某一贸易品的售卖量; X 为其自给量; X^c 为其对某一产品的消费量。

假定4:价格组保持不变。

假定5:市场由 N 个主体组成且数目不变,每个主体的专业学习成本 A 均相同。

从分工角度定义每个市场主体的生产函数:

$$X_h^p = X_h + X_h^s = \text{Max}\{L_h - A, 0\}, h = 1, 2, \dots, m$$

$$\sum_h L_h = 1$$

^①该模型在 Wang 和 Yang 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基础之上引进了市场组织,是对该模型的扩展^[16]。

X_h^p 为某一产品 h 的总产出水平, X_h 为自给量, X_h^s 为售卖量。 L_h 为某一生产者生产某种产品所用的时间。 A 为生产某种产品 h 的学习成本。

每一个出售产品 i 的市场主体,其决策将满足如下条件:

$$X_i > 0, X_i^s > 0, X_i^d = 0, L_i > 0$$

$$X_r = X_r^s = L_r = 0, X_r^d > 0, \forall r \in R$$

$$X_j > 0, L_j > 0, X_j^s = X_j^d = 0, \forall j \in J$$

其中, i 是某一市场主体专业化生产并售卖的某一种产品, $i = 1, 2, \dots, n$; r 是该市场主体从市场上购买的产品,集合为 R ,种类数为 $n - 1$; j 是该市场主体生产的非贸易品,集合为 J ,种类数为 $m - n \geq 0$ 。

根据上述条件,卖产品 i 的市场主体的最优化方案为:

$$\text{Max } U = X_i^c \prod_{r=1}^{r=n-1} X_r^c \prod_{j=1}^{j=m-n} X_j^c \quad (1)$$

约束条件为:

$$X_i^p = X_i + X_i^s = \text{Max}\{L_i - A, 0\} \quad (2)$$

$$X_j^p = X_j = X_j^c = \text{Max}\{L_j - A, 0\} \quad (3)$$

$$L_i + \sum_1^{m-n} L_j = 1 \quad (4)$$

$$P_i X_i^s = \sum_1^{n-1} P_r X_r^d \quad (5)$$

其中, P 代表价格, X^p 代表总产量, $X_i^c = X_i = X_i^p - X_i^s$, $X_r^c = kX_r^d$, $X_j^c = X_j = X_j^p$, X_i^p 和 X_j^p 分别由 L_i 和 L_j 决定。 L_i 是生产售卖品 i 所用的时间,亦为该市场主体的专业化水平。 L_j 是生产自给品 j 所用的时间。为说明市场主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本文选取 X_i^s, X_r^d, L_i, L_j 为决策变量,并对 U 进行一阶偏导求解,得:

$$L_i = \frac{n - (mn - m - n^2 + n)A}{m} \quad (6)$$

$$X_r^d = \frac{P_i}{P_r} \times \frac{1 - (1 + m - n)A}{m} \quad (7)$$

$$X_i^s = \frac{(n - 1)(1 - (m + 1 - n)A)}{m} \quad (8)$$

$$X_i^c = L_i - \frac{1}{m - n} + \frac{L_i}{m - n} \quad (9)$$

$$\forall r \in R, P_r X_r^d \text{ 均相等} \quad (10)$$

$$\forall j \in J, L_j \text{ 均相等} \quad (11)$$

对(6)式 n 求偏导,得:

$$\frac{\partial L_i}{\partial n} = \frac{1 - (m - 2n + 1)A}{m} \quad (12)$$

因为 $(m - n + 1)A = (m - (n - 1))A$ 是市场主体对其专业化生产的售卖品和非贸易品的固定学习费用, $1 - (m - n + 1)A$ 为去除学习费用后用来专业化生产的时间,其值显然大于 0。由此推得:

$$\frac{\partial L_i}{\partial n} = \frac{1 - (m - 2n + 1)A}{m} > \frac{1 - (m - n + 1)A}{m} > 0 \quad (13)$$

由(12)式可知,市场主体的专业化水平 L_i 是由贸易品种类数 n 唯一决定的,由(13)式可得结论 1: 市场主体生产售卖品的专业化水平 L_i 是贸易品种类数 n 的增函数,贸易品种类数越多,每个市场主体的专业化生产水平越高。

根据(5)式和(10)式可知,每个市场主体均满足 $P_i X_i^s = (n-1)P_r X_r^d$ 。另外,由于每一主体均面临相同的市场(因为面临的价格组、总产品种类数和贸易品种类数均相同),通过(8)式可以得出,在A相同的情况下,每个市场主体的专业化供给量 X_s 相等。所以从售卖总额的角度衡量,市场规模为:

$$D = \sum_{a=1}^{a=N} P_{ai} \times X_i^s \tag{14}$$

其中, D 代表市场规模; P_{ai} 代表第 a 个市场主体专业化供给其产品的价格。

把(8)式代入(14)式得:

$$D = \sum_{a=1}^{a=N} P_{ai} \times (n-1) \times \frac{1 - (1+m-n)A}{m} \tag{15}$$

由(15)式可知, N 、 P 、 A 、 m 保持不变时,市场规模 D 由贸易品 n 唯一决定,且 D 是 n 的增函数, n 变大, D 增大。又由于 L_i 是 n 的增函数(由结论1可知),因此,由 n 增加引起的 D 的扩大会促进 L_i 的提高,亦即社会分工水平提高^①。由此,可得如下结论2:市场规模扩大促进社会分工水平提高。

再把(9)式代入(14)式,得:

$$D = \sum_{a=1}^{a=N} P_{ai} \times \left(L_i - \frac{1}{m-n} + \frac{L_i}{m-n} \right) \tag{16}$$

通过对(16)式分析可知, D 是 L_i 的增函数,即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将促进市场规模扩大。由于在此可以将 L_i 视作社会分工水平,因此,可得如下结论3:社会分工提高促进市场规模扩大。

根据上述结论2和结论3可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4:分工促进市场规模扩大,市场规模扩大又促进分工水平提高,分工具有自我累进的功能。因为市场作为协调社会分工的机制,对分工的自我累进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市场的协调作用下,社会分工自我累进、循环演进,并由此形成了分工自我累进循环机制。在此,因为市场是实现分工自我累进的平台,因此市场的发育程度决定了分工自我累进的能力。

3. 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指的是由分工自我繁殖和自我累进相互促进,共同组成的分工循环演进机制,如图1。在分工动态循环演进机制中,虽然分工的自我繁殖和自我累进各自发挥作用,但同时,分工的自我繁殖还促进着分工的自我累进,而分工的自我累进又促使新一轮自我繁殖发生,并由此最终形成分工促进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在整个过程中,企业不仅主导组织内分工,还直接参与社会分工,市场不仅协调社会分工,还引导企业内分工。所以企业是分工自我繁殖机制的载体,而市场是分工自我累进机制的协调者和引导者。由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5:在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机制中,“企业”和“市场”共同促使分工实现自我促进和自我累进,并使分工不断朝着更高水平演进(即在分工的动态循环演进机制中,企业和市场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缺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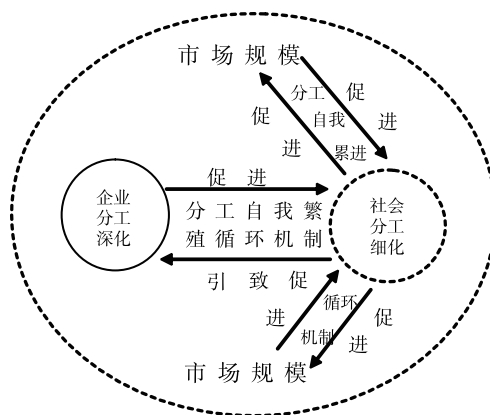


图1 分工动态循环机制

(二) “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发育程度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

根据前文的结论5已知,“企业”和“市场”共同促使分工实现自我促进和自我累进,并使分工不

^①因为根据杨小凯的“社会分工水平是由生产所有产品的所有人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决定的”(这里的“模式”杨小凯将其定义为“所有市场主体的市场决策”)。所以当“模式”给定时,社会分工水平取决于全体市场主体的专业化水平。通过上述模型,我们已经得出了最优模式,而且市场主体总数N保持不变,所以在此个人专业化水平就等于社会分工水平^[9]。

断朝着更高水平演进。而随着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不断增长,因为分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因此,本文认为,企业和市场共同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和市场的发育、发展程度越高,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企业和市场的发育、发展程度越低,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也就越低。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相对于农村,城市内企业和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分工的自我繁殖机制和自我累进机制更完善,分工较好地实现了深化和细化,所以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而农村,无论是企业还是市场均发育程度较低,因此分工的自我繁殖和自我累进不充分,分工基本处于抑制状态,所以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正是城乡间“企业”和“市场”的不同发育和发展程度导致城乡间形成了不同的分工演进机制,进而形成不同的分工演进路径和不同的分工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水平,并最终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由此,本文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和“市场”的发育以及发展水平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异。

三、实证检验

在此,本文用我国 1980—2011 年的统计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验证。

(一) 基本假设

通过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已有文献的梳理^[17-18]不难发现,微观上农户的“道义小农”特征和宏观上国家的“赶超发展战略”导致我国农村企业和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对较低,因此我国城乡间企业与市场的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依据前文的结论——企业和市场的发育以及发展水平差异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本文提出假设 A。

假设 A:我国城乡企业发展水平与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且与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又由于分工与市场发展以及分工与企业发展的相互促进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在分析企业与市场对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必须将环境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在内。根据已有研究成果^[12,19],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了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外向度、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支出等作为控制变量。首先,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决定着先进技术的应用水平,而先进技术的应用又影响着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长期的赶超战略,我国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一直高于农村^①,因此城乡间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差异加剧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对立程度。由此,本文认为城乡间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差异与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程度正相关。其次,因为经济外向度与外贸互为因果,受禀赋、技术、政策等因素影响,中国的进口以能源、矿产、粮食等初级产品以及机械与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主^[20],而出口在 1985 年以前以初级产品为主,1985 年以后则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又由于中国外贸长期顺差,所以外贸对产业的带动与促进主要集中在出口品所属产业上。由此,我国由外贸带动并促进的产业主要集中于城市。所以本文认为,经济外向度提高会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加深,经济外向度与二元结构的程度正相关。再次,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区别国内投资的异质性,在实现资本积累的同时,通过产生内生的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加快了东道国的新技术应用,并因此提高其生产能力^[21],促进了经济增长。据统计,2012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余额为 32.94 亿美元,但同时数据还显示,1997—2012 年间,投向农林牧渔业的比例不足 2%,制造业、信息计算机技术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业、服务业的投资占比

^①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经计算分析可见,1981—1997 年期间,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一直在农村固定资产额的 3 倍左右上下浮动。之后不断上升,2010 年达到 6.64 倍。

高达80%以上,采矿、建筑、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以及公共事业的投资占比不到20%^①,以上说明我国80%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于城市,因此,外商直接投资较好的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程度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政府支出不仅能够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还能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经济增长。除此,由于我国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明显大于挤出效应^[22-23],因此政府支出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但是,1980—2011年间,我国政府支出中用于农业的部分仅占10%^②左右,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政府支出增加会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加深,政府支出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程度正相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B。

假设B: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经济外向度、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支出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且分别与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二) 模型构建

为了对上述假设A和假设B进行检验,本文设计如下计量模型:

$$\ln Dua = \beta_0 + \beta_1 \ln Mar + \beta_2 \ln Fir + \beta_3 X + \mu \quad (17)$$

其中,被解释变量 Dua 代表二元结构程度;解释变量 Mar 代表城乡市场发展水平差异; Fir 代表城乡企业发展水平差异; X 为一组控制变量(详见表1); μ 为随机扰动项。

表1 控制变量的含义及定义

名称	定义	含义
Inv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	反映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Open	进出口贸易总额/GDP	反映经济外向度,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Fdir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GDP	反映外商投资水平,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Gov	政府支出/GDP	反映政府消费支出,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正相关

(三) 变量选择

1.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度量

在此,本文参照理论界普遍采用的方法^[1,11-12],以二元对系数反应二元经济的对立程度。二元对比系数 = 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比较劳动生产率 = 产值比重/就业比重。二元对比系数的取值范围为(1, +∞),系数越大,二元结构越明显。

2. 城乡市场发展水平差异的衡量

交易规模指标通常被用来判断市场的发育程度,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在此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衡量市场发育程度与发展水平的指标,由此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就可代表城乡间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该差异的取值范围为(1, +∞),数值越大,城乡市场的发展水平差异越大。

3. 城乡企业发展水平差异的衡量

因为企业总产值整体反映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所以企业的总产值可以有效衡量企业的发展水平。在此我们用工业企业总产值比乡镇企业总产值来衡量城乡企业发展水平差异。城乡企业发展水平差异的取值范围为(1, +∞),数值越大,城乡企业发展水平差异越大。

4. 控制变量

前文已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演变还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成

①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从1997到2012年,农林牧渔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比仅为1%—2%。而制造业、信息计算机技术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除了1997年为77.9%以外,其余年份基本维持在80%左右,2005年甚至高达89.0%。同期,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和公共事业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不足20%。

②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计算而得。从1980年到2011年,政府支出中农业支出占比在7%—13%之间围绕10%上下浮动。

果^{[12][19]},并以数据可得性为原则,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见表1。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利用我国1980—2011年的统计数据进行验证,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2年)和《中国乡镇企业年鉴》(2009—2012年)。上述变量的统计特性见表2。

(四)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本文首先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经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分别在1%或5%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其次,本文对上述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可以对模型进行回归。最后,本文对模型进行OLS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

表3显示,模型残差的ADF检验结果高度平稳,因此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0.78的R²也显示模型拟合较好,即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另外,表3还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

(1) *LnMar* 和 *LnFir* *t* 检验高度显著,说明 *Mar* 和 *Fir* 对 *Dua* 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即城乡间企业与市场的发展差异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LnMar* 和 *LnFir* 系数为正,说明城乡间企业与市场的发展水平差异与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程度正相关,由此假设A通过了验证。

(2) *LnOpen* 和 *LnGov* *t* 检验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外向度和政府支出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有显著影响,且与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程度正相关,这与假设B完全相符。但是 *LnInv* 和 *LnFdir* 的 *t* 检验不显著,这与假设B不符,由此假设B没能完全通过检验。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 *Inv* 未能通过检验的原因是:一方面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中相当大的比重(约占40%左右)投向了国有企业^①,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耗损了大量投资,使得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较低;另一方面,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城市的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在逐步降低。由此,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影响并不显著, *Fdir* 未能通过检验的原因是:据测算,约70%^②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匀分布,使得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基本不受此因素影响。因此从全国范围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工动态循环演进理论,本文分析和验证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原因,并

表2 变量统计特性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Dua	1.585047	0.148566	1.325052	1.882992
LnMar	0.776692	0.393978	0.117893	1.316742
LnFir	0.709289	0.595173	0.144255	2.040997
LnInv	1.381039	0.506835	0.836850	3.504662
LnOpen	-1.105951	0.462637	-2.076279	-0.428157
LnFdir	-5.805637	0.496995	-6.658898	-4.855282
LnGov	-1.930700	0.058071	-2.032156	-1.835254

表3 模型 OLS 估计结果及检验

变量	系数	标准方差	T 统计量	P 值
c	3.309264	0.580184	5.703817	0.0000
LnMar	0.408867	0.111316	3.673050	0.0011
LnFir	0.266769	0.108705	2.454055	0.0214
LnInv	0.023857	0.036451	0.654504	0.5188
LnOpen	0.194369	0.095467	2.838929	0.0525
LnGov	0.881776	0.310602	2.838929	0.0089
LnFdir	0.059690	0.068064	0.876964	0.3889
		R ² = 0.782391	A - R ² = 0.730165	
方程的总体评价		F = 14.98082	P 值 = 0.0000	
对模型残差的 ADF 检验		T 统计量 = -4.016396	P 值 = 0.0043	

①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仅计算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内资企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中就达到了40%,其中,2008年为40.7%,2009年为41.4%,之后略有下降,但2011年也达到36.9%,2012年35.2%。

②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过计算而得。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广东九个省份。计算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额在全国一直占有较大比重,保持在70%左右,1988年为66.7%,1989年占比达到了77.0%,之后一直在75%左右上下浮动,到2004年回落到67%,然后又缓慢上升到2007年的68.8%,再之后一直维持在60%左右,2009年为58.4%,2010年为55.8%。

得出如下结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使城乡形成了不同的分工演进路径,并由此导致城乡形成了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认为,我国要顺利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关键就是要着力促进农村企业和市场发展。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企业与市场发展,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农业产业化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实行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规模化生产、产供销、贸工农、农科教一体化经营。由此,农业产业化能够促进农村企业与市场发展,实现农村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并由此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逐步实现二元结构转换。但是,农业产业化发展以规模化生产为前提,而这些又要以连片的土地为基础。因此,本文建议各级政府要抓住城镇化发展的契机,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新型农村企业的建设与发展,使留在农村的小农能就地转化为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农业工人,并通过必要的专业技能培训和机械化作业,提高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除此之外,还建议各级政府进一步扩大农产品交易平台建设和物流体系建设,提高农产品流转速度,促进农业快速发展,并逐步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

第二,以农业促进制度推动农场建设和农村市场发展,进而推进二元结构转换。农场指的是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生产的农业生产企业或生产组织。农场与小农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产品的商品化^①,所以农场能够助推市场发展。另外,农场的规模化,尤其是集约化生产能促使农业分工细化,使分工实现自我促进和自我累积,所以推进农场发展是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抓手。在推进农场发展的过程中,本文首先建议通过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并在家庭农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促进合作农场、公司农场和其他农业组织形式;其次建议尽快出台《农业促进法》和《农场促进法》,为农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以“普惠金融”支撑农村企业与市场发展,实现二元结构转换。普惠金融指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强调每个人应该拥有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强调共同富裕。普惠金融的主要任务是为传统或正规金融机构体系之外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甚至是贫困人口提供机会,为贫困、低收入人口和微小企业提供可得性金融服务。因此普惠金融具有促进农村企业发展(因为农村企业基本为小微企业),带动农村市场发展,促进二元结构转换的功能。因为普惠金融既需要宽松的金融监管制度提供生存、发展空间,又需要优良的金融环境解决持续发展问题,所以为使普惠金融真正发挥支撑农村企业与市场发展,促进二元结构转换的功能,本文建议在农村金融领域建立包容性金融监管制度^②,鼓励和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尽快建立农村征信制度和农业担保、保险制度,以优化农村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 [1] 蔡雪雄.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及趋势分析[J]. 经济动态, 2009(2): 37-40.
- [2] 李昌明, 王彬彬.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J]. 经济动态, 2010(10): 70-79.
- [3] 张应禄, 陈志刚.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测度、变动趋势及政策选择[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11): 84-92.
- [4] 刘新.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原因探析[J]. 农业经济, 2009(5): 3-5.
- [5] 袁志刚, 解栋栋. 统筹城乡发展: 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的协调配置[J]. 经济学家, 2010(08): 77-83.
- [6] 洪银兴. 三农现代化途径研究[J]. 经济学家, 2009(1): 12-18.

^①农场生产以盈利为目标,小农生产以自给为目标。所以农场的产品是用以销售的商品,而小农的产品大部分为自给品。

^②包容性金融监管制度指对服务于农村和小微企业的弱势金融群体(农村金融机构和小微金融机构)采取的有别于其他商业金融的差异化金融监管制度安排,使弱势金融在更趋合理的监管约束下有序运行,以实现弱势金融的可持续性、共享性和普惠性^[24]。

- [7] 朱志萍. 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制度变迁与城乡一体化[J]. 软科学, 2008(6):104-108.
- [8] 蓝海涛.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演变的制度分析[J]. 宏观经济管理, 2005(3):47-49.
- [9] 杨小凯. 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0] 高帆, 秦占喜. 二元经济的反差: 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J]. 经济科学, 2003(1):97-103.
- [11] 高帆. 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J]. 经济研究, 2005(9):91-102.
- [12] 刘文超, 白永秀. 分工、交易效率与城乡二元经济转化[J]. 当代经济科学, 2011(2):60-66.
- [13] 唐·埃思里奇. 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 [14]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15] 盛洪. 现代制度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 [16] Jianguo Wang, Xiaokai Yang. Pursuit of Relative Utility and Division of Labor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6, 23(8):20-37.
- [17] 贾生华, 李航. 噪声交易者预期与房地产泡沫——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4(3):85-92.
- [18] 丁宋涛, 刘厚俊. 垂直分工演变、价值链重构与“低端锁定”突破——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5):105-112.
- [19] 陆鸣, 陈钊. 城市化, 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和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04(6):50-58.
- [20] 周洪霞, 杜铁斌. 浅析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现状[J]. 商情, 2011(49):35.
- [21] 姚树杰, 冯根福, 韦开蕾. 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 经济研究, 2006(12):35-46.
- [22] 杨子晖. 政府规模、政府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6):77-91.
- [23] 关浩杰.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析[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3(3):17-23.
- [24] 冯果, 李安安. 包容性监管理念的提出及其正当性分析——以农村金融监管为中心[J]. 江淮论坛, 2013(1):109-116.

[责任编辑:杨志辉]

The Way of Chinese Urban-rural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Dynamic Cycle Evolution of Labor Division

GU Shen¹, MA Jingbiao¹, MA Hanmu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71012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abor division, this paper first establish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dynamic cycle evolution of labor division”, and then makes a research on the reasons of urban-rural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is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we next conclude that the primary causes of urban-rural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is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market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dual economy theory.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ves the conclusion by using the time series data through 1980—2011 in China. Finally, we conclude tha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irm and market through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system and generally preferential finance which is deepening division of labor in rural areas and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levels. It is the key of China to successfully achieve the du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 urban-rural gap;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